

## 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上)

陈 炎

前 言

缅甸,中国史书汉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明始称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为半岛上面积最大(67万平方公里),人口众多(约3千5百万)的国家,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喜马拉雅山余脉自我国延伸入缅,分东西两支逶迤南下,形成西部的阿拉干山脉和东部的掸邦高原,为其东西两大屏障;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都源出我国,流经缅甸入海,为其自北向南的两大动脉。它们滋润着我们两国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哺育着我们勤劳而勇敢的人民。中缅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有长达两千一百多公里的国境线,又有山山相依,水水相连的自然通道,自古以来就把我们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缅甸诗人写的《缅中友好歌》第一句就是:“中缅边境连边境,又是兄弟又是亲。”唱出了两国兄弟情谊,非同一般。

中国是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古国,很早就有用文字记载中缅两国互相交往的史书。从秦汉到明清的历代文献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而在缅甸特别是在蒲甘以前,国内保存的原始史料不多,因此,我国古籍中有关缅甸和中缅关系的记载,引起

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常被他们反复引用。缅甸的史学工作者更认为中国人民能保存这样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和文化遗产。他们为了使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能更加发扬光大，现正开始利用中国史料研究中缅两国在历史上的关系，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随着中缅友好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两国友谊的不断增强，我国人民也迫切要求对缅甸各方面的了解，尤其是对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了解。为此，我写了这篇拙作，旨在抛砖引玉，先就两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 一、两国文化交流的发轫时期

在缅甸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中缅两国之间友好的神话故事。据说在远古时代，有一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结果生下三个龙蛋：一个破裂后变成了一块宝石，所以缅甸盛产宝石；一个孵成了女孩，并由许多神仙把她送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另一个孵成了男孩，后来就成为缅甸有名的国王——漂苴低。<sup>①</sup>

这一神话说明了中缅两国人民都是太阳神的后裔；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中缅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渊源和线索。例如缅甸人民为什么自古以来就称中国皇帝为“乌（念Wū）底巴”（缅甸语“乌”就是“蛋”，“巴”就是“生”，意思是“同为蛋生”，也就是“同母所生”）；又为什么现在缅甸人民一见到中国人民就用缅甸语亲切地称中国人为“胞波”（缅甸语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或“瑞苗”（缅甸语意思是“亲戚”）。我们知道前面介绍的这个故事之后，对上述这些亲切的称呼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认为这就是“胞波”友谊的由来。

不仅如此，这个神话故事还校正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考证

“乌底巴”这个称呼的错误。比如英国研究中缅关系史的巴克（E.H.Parker）先生，竟把“乌底巴”中的“乌底”，说成是汉“武帝”（udi）的对音。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则把“乌底巴”说是吐蕃（今西藏）授予南诏（今云南大理）国王异牟寻的梵名“日东王”（udaya）译音。<sup>②</sup>其实，缅甸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在这以前早就开始了。他们不懂“乌底巴”这个典故的由来，于是曲解了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友谊的真实内容。

我们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个象征我们两国人民兄弟情谊的故事。今天，我们的诗人和文学家都喜欢用“胞波”和“瑞苗”这两个亲切的缅语词汇做诗写文章，来表达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例如陈毅副总理生前写的《燕子湖边》和《在下关宴缅甸友人》等诗篇中，一再引用“瑞苗”和“胞波”。<sup>③</sup>诗人赵朴初在为中缅边界条约志庆时也有“尽边界缤纷花雨，好邻居世代‘胞波’”的诗句。我国作曲家时乐蒙，还谱写了一首《中缅两国是‘胞波’》的歌曲。今日“胞波”已经成为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了。

据考古学家莫里斯的研究，1930年在缅甸叻外（今称马圭）县德马多河发现的石斧、石楔、石凿，和在东彬发现的小圆石器，同我国周口店出土的石器很相似，又在上下亲墩县和在瑞波县境内出土的环石，也同中国的仰韶文化新石器相似。<sup>④</sup>他还认为在缅甸掸邦境内发现的铜器和青铜器，经分析鉴定属于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主要是受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其铸造青铜器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sup>⑤</sup>上述在缅甸出土的石器和青铜器，都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它们是中缅两国人民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就有了文化联系的历史见证。

再从缅甸各民族的起源来考察。根据出土文物、古代文献和各民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中外学者都认为，现在定居在缅甸境内的各民族，并不是本地的土著民族。<sup>⑥</sup>他们大都在史前就从我

国青藏和云贵高原先后迁入缅甸境内。按他们的语族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大类：

（一）孟—高棉语族：主要为孟族（在缅甸亦称得楞族）、崩龙（在中国境内现称得昂族）等族。他们在史前就自我国云贵高原迁入缅甸，是最先移居缅甸的民族。

（二）藏缅语族：主要为缅甸族（骠族）、克钦、拿戛、钦、傣傣等族。他们自公元前九世纪后，就陆续自青藏高原迁入缅甸。

（三）侗泰语族：主要为掸族（在我国境内称傣族）等族，他们约自公元前六世纪后，陆续自我国云贵高原迁入缅甸。<sup>①</sup>

上述语族说明了中缅两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缅甸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在音缀、语法结构和词汇音义上，有些地方是相同的。如汉语和缅语都称兄为“哥哥”或“阿哥”其音义完全相同。又如我国西南兄弟民族如藏族、景颇族等和缅甸境内的缅甸族、克钦族、克伦族所用语言均同属藏缅语族；我国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和缅甸境内的掸族则同属于侗泰语族。就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看，从发音、语法结构到词义，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今天在缅语中还借用大量的汉语。例如：人力车、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唐缸（帆船）、舢舨等。我们知道，语言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进程所产生的”<sup>②</sup>它又是人们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因此，中缅各族人民之间，语言文字的关系如此密切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两国人民长期交往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今天，居住在两国边境的兄弟民族，有的不但说同一种语言，而且穿同一种衣服，喝同一条江的水。正如陈毅副总理生前写的《赠缅甸友人》诗中所说：“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sup>③</sup>难怪缅甸朋友都说：中缅两国各族人民同出一源，自古以来就是亲兄弟。也可以认为这是探讨

中缅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溯源的又一条线索。

## 二、秦汉时两国文化交流的开始

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远在公元前就成为我国西南通往印度乃至欧洲的陆上途经要地和海上交通的中转站。这两条衔接亚、欧、非三洲的大动脉，不仅对促进中缅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历史的进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下面就谈谈传播东西方文化的这两条渠道：

（一）蜀一身毒道：它是我国西南地区，古时对外交通途经缅甸到印度的商道，起自盛产蜀锦的四川成都，经云南西部的大理、永昌，通往缅甸、印度等国。

秦汉时，在中缅边境今腾冲一带有个乘象国。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就是说四川已经有民间商人私自到此经商。又据《史记·西南夷传》卷116记载：“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印度），可数千里，得蜀人市，或闻邛西（今四川西昌地区以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说明四川的民间商人不仅在中缅边境的滇越国经商，而且已从这里途经缅甸到印度做买卖。可见四川经滇缅到印度已经有了商道。因此，张骞回国后，就向汉武帝建议想用官方力量打通这条蜀一身毒道<sup>①</sup>。虽然官方的努力失败了，但四川的民间商人，正如文献中所说，早已到印度经商。可见这条商道在民间是通行无阻的。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我认为很可能是四川的名产“蜀锦”或“夏布”。（因为当时还没有棉花，不可能是棉布。）事实上，中国的丝绸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已传入印度<sup>②</sup>。公元前二世纪，不但传至今印度而且已传至阿富汗了。

据哈威所著《缅甸史》的记载，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今亲墩江 hindwin R.）经曼尼普尔（Manipur）乘马需三月乃到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sup>②</sup>。这是中国丝绸从陆路传入上缅甸，然后再从缅甸传入印度、阿富汗乃至欧洲的外国史料。它和我国上述文献记载张骞出使大夏的年代、地点和路线，不谋而合，可以互相印证。又《后汉书·哀牢传》说，哀牢地区“出光珠、琥珀、翡翠、琉璃，轳虫（即海贝）蚌珠。”这些都非哀牢土产，而是缅甸、印度的特产，很明显是从缅甸、印度传入的。此外，我们还可从出土文物得到旁证。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和李家山等汉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琉璃、玛瑙、玉石和海贝（古代用作货币）以及在腾冲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中发掘出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千枚。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都是中、缅、印商人，在此通商时，互相贸易交换，遗留下来的文物的佐证。这条最初以传布丝绸为开端的商道，现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sup>③</sup>。这条丝路起自我国西南，途经缅甸、印度然后一直西行至阿富汗与西域“丝绸之路”在木鹿（Merv今苏联境内塔什干的马里）相汇合后，两者合为一道，直通欧洲的地中海。这是一条横贯欧亚两洲，沟通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它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

（二）南海道：中缅两国的海上交通也开辟得很早，根据《汉书·地理志》下“粤地”条记载，从我们雷州半岛（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航海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康契普拉姆）要经过都元国、邑卢没国、谿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其中除都元国和邑卢没国外，据中外学者多数人的考证，上述国家都在今缅甸境内沿海一带。<sup>④</sup>记载中还提到这些国家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常来献见。中国海船带去大量黄金、丝绸交换这些国家的特产：

明珠、璧琉璃和奇石异物。早期的航海是沿海岸而行的。因此，缅甸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古名苏伐那斯（sobanas）港<sup>⑮</sup>就成为中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就是说，至迟公元前二世纪，我国的丝绸已经通过陆路和海路，先运到缅甸，然后再从缅甸转运到其它国家。这条途经南海传播丝绸的海路，就被称为南海“丝绸之路”。<sup>⑯</sup>

最初，中国丝绸外传，只是作为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商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乃至人民生活和增进友谊都发生了密切关系的媒介，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⑰</sup>我国西南自古盛产丝绸，主要是通过缅甸向外输出的。如果说中国的丝绸向外传播，是我们祖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那么，其中就有缅甸的一份功绩。这是中缅两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中缅两国的陆海交通和贸易往来，虽可上溯到秦汉，但仅以民间为主，规模也不大。到公元69年设永昌郡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的永昌地处中缅边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内地商旅云集，且有“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屡世”之称。开辟永昌郡正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设永昌郡后，不仅促进了两国边境人民的贸易往来，也为两国建立邦交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置永昌郡不久，就有所谓“永昌徼外”，也就是在今缅甸境内的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来我国通好。据《后汉书》中《西南夷传》、《和帝纪》和《袁牢传》等记载，公元94年“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公元97年“掸国重译奉贡”；公元107年傜僇部族“献象牙、水牛、封牛（双峰黄牛）”；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幻人（杂技演员）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丝织品）各有差也。”；公元131年掸国

王又来献见。

据学者们考证，上述这些部落、国家都在今缅甸境内。夏光南先生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而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它是“都卢”的对音，似在上缅甸的太公<sup>⑧</sup>。关于僬侥部族，我国《史记》、《列子》中都有记载，说他们身高不过三尺。学者们认为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sup>⑨</sup>。学者们更认为上述的掸国就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曾先后三次来我国通好。特别献乐及幻人，并在汉都洛阳作精采表演，他们精湛的技艺受到我国文人学士的一致赞赏。如张衡在《西京赋》中及傅玄在《正都赋》中都对“都卢寻橦”（爬高竿）这个节目作了动人的描述<sup>⑩</sup>。李龙在《平乐观赋》中也对“跳丸”给予“临高履芽，飞丸跳剑”（踩在高空的绳索上表演技艺）的赞语<sup>⑪</sup>。称为“鱼龙之戏”的节目，能变成跳跃的鱼，其吐水作雾更使人眼花缭乱<sup>⑫</sup>。这些杂技魔术的输入，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汉代遗留下来的石刻画像砖中见到<sup>⑬</sup>。

文献中提到这些演员（幻人）“自称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这句话很重要，说明掸国使团中不仅有掸国人而且还有“大秦”人，学者们虽然对这个“大秦”还没有一致的定论，有的指罗马帝国，有的指南印度，即《法显传》中的“哒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不论是从东方的印度还是从西方的罗马，当时他们随掸国使团来献的音乐、杂技、魔术等文化艺术，都是以缅甸为媒介而介绍到中国的。

随着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两国在政治上也开始发生了邦交关系。“封掸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可视为它是中国第一次授予缅甸首领的汉朝官职，也是中缅两国最早建立邦交和汉朝官制、汉字和金石艺术……等传入缅甸的开始。

### 三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两国的文化交流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无疑是我国开发西南的重大事件。他把汉族的先进文化传到中缅边境，从而对邻近的缅甸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华阳国志》记载，武侯既平滇“……分其羸弱，配大姓为部曲。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又：“劝诸夷筑城堡，务农桑，诸夷皆自山林徙平原。”上述诸葛亮创立的分兵以配大姓和世袭的土司制度，千余年来，对西南兄弟民族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并且也影响到邻近的缅甸。缅甸和中国毗邻的掸邦和北部中缅边境一带，至今仍沿袭这个土司制度。诸葛亮劝各族人民“筑城堡，务农桑”，把汉族先进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西南各兄弟民族。例如《蛮书》中记载的耕田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梯田)殊为精好。”<sup>②4</sup>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北部也和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一样，至今仍然沿用这种耕田法。他们也是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格，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在后下种，与上述记载吻合。又《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云：“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注云：“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它和缅甸山区少数民族治山田的方法亦如出一辙。这是两国劳动人民互相学习，并在生产实践中共同总结出来的经验，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还说：“缅甸族向南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吸取了各种文化……。”<sup>②5</sup>可知自诸葛亮南征，直至唐代的南诏，我国西南各族人民和缅甸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仍在不断互相交流和影响。

今天，关于诸葛亮的传说，还在缅甸境内广泛流传。中缅

边境各兄弟民族对诸葛亮都很尊敬。中缅两国各族人民为了纪念他，建有诸葛祠、武侯庙、孔明城。如赵汝适在《诸蕃志》“蒲甘”（今缅甸）条中说：“国有诸葛武侯庙。”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也提到普坎（即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谢清高在《海录》中还说：“摆古（今缅甸勃固）有孔明城……。”另外，王芝在《海客日谭》、师范在《滇系》等书中也都有类似记载。在中缅边境的腾越、永昌一带有关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诸葛亮城等名称和遗迹，几乎比比皆是。可见诸葛亮南征对中缅边境各兄弟民族的影响之大以及中缅边境人民对他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极盛时期。而缅甸又是崇信佛教的国家，位于中、印两大佛教国之间，在传播佛教文化上，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佛教自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公元一世纪时，著名的印度高僧摄摩腾（亦名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据说就是取道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来到中国的。据《高僧传》初集卷一记载，这是中国有和尚的开始。他们在中国翻译了五部佛经，有四部已经失传，仅存的一部《四十二章经》是我国现存佛经中最早的一部。魏晋南北朝时，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通过缅甸来我国弘法的高僧就更多了。五世纪中，从师子国到缅甸去传教的，有著名高僧佛音尊者。同时他还派弟子僧伽跋罗到中国来弘法。<sup>②</sup>六世纪中，印度著名的高僧拘那罗陀（亦名真谛），也是经过今下缅甸的丹那沙林来中国的。他们翻译了许多经典，把佛教文化传到我国。我国云南盛行的佛教——密宗，和缅甸蒲甘时代的阿利教极相似。七世纪后它自印度传入南诏，先由海路传至下缅甸，然后溯伊洛瓦底江再传到云南大理，对南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理白族地区至今仍流传着关于密教的许多神话故事。密教的译名如檀越、吒利……等，中国佛教经典翻译者也经常借用。

缅甸又是上座部（小乘）佛教通行之地。据我国佛教专家汤用彤先生说：“有些小乘佛教的经典，很可能曾从缅甸传入中国。”<sup>⑲</sup>云南傣族地区盛行的小乘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的。它始于何时，因无确凿材料，尚难断定；但在公元1596年时，已经很流行了。因为是年西双版纳最高封建主召片领，曾娶缅甸东吁（我国史书亦称“洞吾”）王朝的公主为妻，当时随同公主前来的一批缅甸的高僧，就在西双版纳传播小乘佛教，并在景洪建立了第一座寺院。这是我国西南兄弟民族地区从缅甸传入的宗教建筑，也是“缅寺”的由来。西南兄弟民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建造“缅寺”的诗篇，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首：

《遮岛（前南甸司官所在地）缅寺》

遮岛城西缅寺开，    齐云楼殿势崔嵬。  
铸金佛像成千百，    都是边民血汗来。<sup>⑳</sup>

另一方面，中国的佛教文化也传到缅甸。据缅甸的著名考古学家杜生诰的研究，中国的佛教文化对缅甸文化有过重大的影响。他着重指出：“我们不能否认，在公元四世纪时，佛教已由中国传入缅甸。……最早数世纪中，中国僧侣曾在太公（缅名德贡）、卑谬和蒲甘等地讲经布道，与用梵文讲授的印度僧侣分道而进。但中国的政治势力较强，因而传授较占优势且收普及的宏效。”又据杜氏考证，缅文中有些佛学名词，源出汉语，虽然汉语中的佛学名词则来自梵文或巴利文。如“南无”、“罗汉”，“喇嘛”、“佛爷”、“涅槃”……等，都是再由中国传入缅甸的。<sup>㉑</sup>

缅甸还是中国僧侣从川滇到印度取经的必经之地。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慧轮传》中说：在印度笈多王朝时，曾有中国僧侣二十多人，从蜀川牂牁道至印度，国王室利笈多还建筑了一所“支那寺”，供中国僧侣停息。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也谈到牂牁道。他说，从蜀川到印度的这条道，是大唐与五天竺陆路之捷径。<sup>㉒</sup>据梁启超的估计，循这条道到印度去留学

的中国僧侣，占南北朝、隋唐间留学生人数的九分之一。<sup>③</sup>

我国僧侣不仅从陆路经缅甸到印度，而且还从海路到达下缅甸。如唐代高僧智岸、义辉和义朗等人曾到下缅甸的郎迦戎，<sup>②</sup> 求经弘法，受到当地国王以上宾之礼接待。后来智岸和义辉都在该地病故。唐代最著名的法师玄奘和义净，曾先后到印度各地游历多年，虽然未曾到缅甸，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下缅甸沿海的古地名，如“室利差咀罗”（今卑谬）、“迦摩浪迦”（今勃固）和“堕罗钵底”（今直通至泰国）等国的方位，<sup>③</sup> 对考证和研究古代中缅关系的史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了中缅两国佛教徒之间，很早就有了佛法传承的关系。随着佛教的相互传播，佛教的经典著作、佛学哲理、天文历法、医学药物以及各种服务于宗教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也随之在中缅两国间互相交流并发扬光大。

#### 四、唐代骠国献乐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

缅甸人民自古爱好音乐。继后汉掸国献乐后，公元 802 年骠国王雍羌又遣王子舒难陀率领一个包括有乐工三十五人的友好使团，到中国访问，并在长安宫廷中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诗人白居易为此还写了一首著名的《骠国乐》诗：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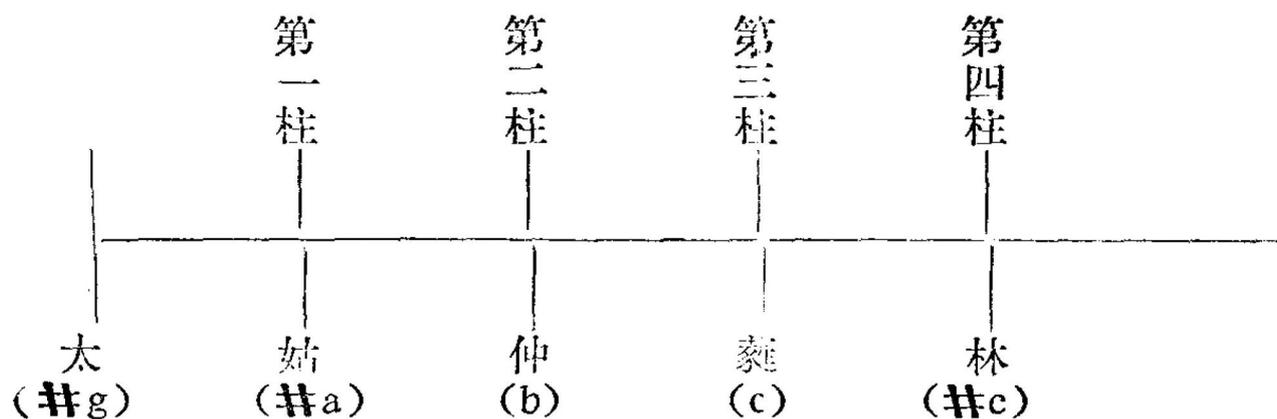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薺龙蛇动。……<sup>④</sup>

除了白居易对骠国乐作了如上描述外，诗人元稹在《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胡直钩在《全唐诗》卷四六四；王溥在《唐会要》卷一〇〇，也都为《骠国乐》写了许多动人的诗篇，至今脍炙人口。唐次还写了《骠国乐颂》选入在《说郛》中。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对骠国献乐的重视，不象后汉时还有象陈禅这类人，胡说什么“帝王之庭，不

宜设‘夷狄’之伎”，公开出来阻挠。<sup>⑤</sup>而唐代的骠国乐却受到宫廷和文人学士的如此喜爱。这就是说，唐代在吸收外国文化艺术的营养和消除大国排外思想方面，比之后汉时已有了明显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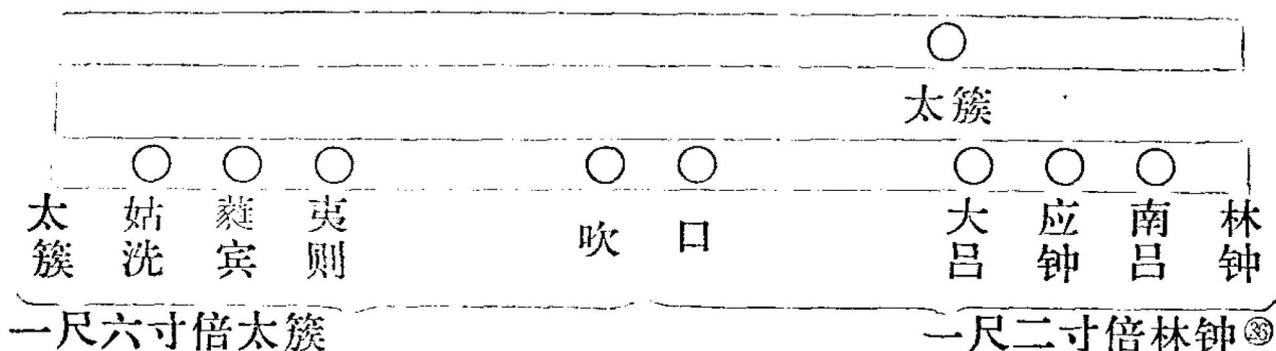
关于骠国乐中的乐器和乐曲，《新唐书·骠国传》中记载得特别详细。今根据记载的乐器和乐曲，列表如下：（见下页表）

上表是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制成。书中对每种乐器的名称、制作形状乃至大小尺寸和精美装饰以及分属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八音和它的音律等，无不作了详尽的描述，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这在唐代乐调的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他把骠国的独弦匏琴，按文献记载，根据日本和阿拉伯琵琶的弦音分划，得出以下诸律：



他还认为骠国传入的，通两均的两头笛，在唐代乐律的决定上有最重要的效用。按文献中的记载，他又把两头笛的律制，图解如下：

### 骠国两头笛律制



### 骠国传入我国的乐器

八音	乐器名称	数
打击乐器	金	铃 钹 4 铁 板 2
	革	*三面鼓 2 *小鼓 4
		弹奏弦乐器
	贝	
竹	*横 笛 2 *两 头 笛 2	
	匏	
牙		
角	*三 角 笙 1 *两 角 笙 1	

### 骠国传入我国的乐曲十二

序数	唐译名	骠曲名	调
1	佛 印	没驮弥	黄钟商
2	赞娑罗花	咙莽第	
3	白 鸽	答 都	
4	白鹤游	苏曼底哩	
5	斗羊胜	未 乃	
6	龙首独琴	弥思弥	
7	禅 定	掣览诗	
8	甘蔗王	遏思略	黄钟商 (伊越调)
9	孔雀王	桃 台	
10	野 鹅	咙聪网摩 扈 那	林钟商 (小植调)
11	宴 乐		
12	涤 烦		
	(亦曰 笙舞)		

表中有 \* 符号的, 是有音律可考的, 占全数的过半。

在骠国传入我国的乐曲十二的表中，值得注意的是，骠曲名和唐译名所解说的意义，不但对研究缅甸古代的音乐，而且对研究已经失传的古代骠族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骠国音乐传入我国，对我国音乐的影响至为深远。据音乐家的研究，缅甸至今仍用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这和我国的乐制非常相似；他们在表演现代双人舞和小演唱的节目中，其歌词或以五音体或以七音体为基础，在必要的发展时又变成了十个音节一句，这和我国的古代诗歌形式又是何等相似。直到今天，在缅甸的音乐中，从所用的乐器到歌唱的曲调，有一些在中国人民听来仍然很熟悉。如缅甸文化代表团在我国演出一支曲子，其前段和我国广东的民间音乐《漂洋过海卖杂货》完全相同。有些音乐和我国广东、福建的曲调，也有极相似之处，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当我们听到这些扣人心弦、清脆动听的音乐和曲调时，就有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

缅甸人民自古爱好音乐舞蹈。缅甸舞蹈的特点，《新唐书》也说“其舞容乐器异常”。它表现在：舞姿优美，动作刚柔并蓄，轻快舒畅；手臂、腿部、身段、眼睛、颈部配合得非常紧密，特别是与音乐的配合很讲究板眼。它和我国京戏中对手、眼、身、法、步的严格要求和对音乐配合也很讲究板眼非常相似。缅甸舞蹈的姿势，据说是从木偶戏中演变而来的。而我国的木偶戏，起源也很早，春秋战国时的偃师就是演木偶戏的大艺术家。我国古典戏剧中有些动作姿势，也来自木偶戏。又如缅甸古典舞剧《迪门奥格与龙公主》中，龙公主这个主角，也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在唐人的小说和戏曲中就有柳毅传书与龙公主相爱的故事。所以缅甸著名作家吴巴巧在《缅甸的剧和中国的戏》一文中说：“缅甸古典剧和中国古典戏，至今不受西方英美现代戏剧的影响而有所改变，独具一格，富有民族特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sup>③</sup>由此可见，中缅两国的音乐、舞蹈和戏剧等各方面都有

相同之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国人民长期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骠国献乐不仅对我国音乐、舞蹈、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丰富了我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新唐书》中关于骠国献乐的记载，中外学者都一致公认：它是世界上仅有的，记载骠国乐器、乐曲最详尽也最有价值的文献；更是当今研究缅甸古代史、音乐史和中缅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史料。缅甸史学家对我国《新唐书》和其他古籍中有关骠国的各种翔实记载非常重视。因为缅甸本国有关古代骠国的记载已经失传，只能从出土文物和碑文中窥其片断。缅甸的学者们为使祖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更加发扬光大，现正集中力量致力于翻译考证中国古代文献，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sup>⑧</sup>

骠国献乐是以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一次外交活动，获得良好的效果。它是和当时西南最高地方政权的领导人——韦皋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团结政策和睦邻的外交政策分不开的。在韦皋的不断争取和团结下，使本来同唐朝政权不和的南诏，终于同唐朝和好。他还选送南诏各族子弟到成都求学，为南诏培养出各族青年达千余人之多。韦皋的这一民族团结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它不但使南诏和唐朝之间增进了友谊，而且也影响到受南诏势力控制下的骠国。《旧唐书·骠国传》载：“〔骠〕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于是派王子率友好使团出使中国。从骠国方面看，我们知道南诏在阁罗凤时，就已占领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寻传族地区（今克钦邦），骠国也受其控制。正如《新唐书》中说：“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南诏王还自称“骠信”（意为“骠国之君”）。这种关系对骠国来说，当然不会心悦诚服。所以骠国献乐不只是听命于南诏，其目的是想借助唐朝的强大势力去影响南诏，以便摆脱南诏的控制。《新唐书》中说的“骠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这句话，就是对这个目的的最好概

括。可是骠国要和唐朝直接发生关系在当时是有困难的，因为中间有南诏阻挡着。正在这时，南诏异牟寻遣使向韦皋献歌曲，且令骠国献乐。这显然是韦皋的策略，想利用献乐这个名义，通过南诏去团结骠国。骠国能借献乐之名，不受南诏的阻拦，同唐朝发生直接的联系。这是韦皋采取睦邻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由于韦皋团结南诏共同去对付吐蕃，南诏就撤离了入驻骠国的军队，从而解除了南诏对骠国的威胁。这不但对骠国有利，而且对唐朝和南诏也都有利。这是骠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也是中缅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韦皋通过骠国献乐——这一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在政治上得到使各方面都如此满意，并且达到了“敦睦邦交”的效果。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sup>⑩</sup>。

## 五、宋朝同蒲甘的文化交流

10~11世纪，对中缅两国来说，都是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政治中心南移，北方的陆上交通因受辽金西夏所阻，对外联系则以海上交通为主，同时，加强了从西南途经缅甸的陆海两路交通，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发生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缅甸国王阿奴律陀也把分裂割据的缅甸统一，建立了以蒲甘为中心的蒲甘王朝。所以宋朝称缅甸为蒲甘。由于北方云南有强大的段氏大理国的阻挡，蒲甘要与宋朝中央政权打交道，往往要通过大理国，一旦被阻拦就不能自由交往。虽然两国的陆上交通并未中断，但都开始重视发展海上交通。1057年阿奴律陀攻占下缅甸孟族的直通王国后，就控制了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要冲的直通和丹那沙林沿海地区，对外联系除了毗邻各国仍循陆路外，就以海路为主，开始同我国发生海上贸易的交往。宋朝在东南沿海的海港城市设市舶司，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在提

到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的舶船时，列了许多国家，其中就有与蒲甘国进行贸易的记载<sup>④</sup>。这是宋朝与蒲甘有海上贸易交往的开始。曾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海上交通路线。他在《岭外代答》卷二“注辇”条中说：“注辇国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国当自故临（今印度奎隆Quilon）国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亦可往。”又在“蒲甘”条中说：“蒲甘国自大理五<sup>④</sup>程至其国。”这是从我国西南大理由陆路至蒲甘，再由海路到印度的交通路线。

两国海陆交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缅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缅王阿奴律陀执政（1044~1077）不久，闻知中国大理崇信佛教，并有一枚神圣的佛牙，曾亲率其子江喜佗和四员大将至云南大理求取佛牙。虽然他未获得佛牙，但在大理逗留了三个月之久，受到大理国王的隆重接待，双方言谈甚欢，增进了两国友谊，并受到了大理佛教文化的熏陶。回国时双方互赠礼品，大理国王赠送阿奴律陀一尊碧玉佛像。回蒲甘后，他把这尊佛像供奉在蒲甘王宫中。它被认为是中缅两国有着共同信仰的象征，成为历代国王顶礼膜拜的纪念圣物<sup>⑤</sup>。这是中国佛教文化对蒲甘产生影响的历史记录。这段历史未见我国史籍，可补我国史书的不足。而在缅甸民间关于缅王阿奴律陀亲至“乾陀罗”（指中国，此处指云南大理）求取佛牙，受到中国“乌底巴”（指中国皇帝，此处指大理国王）的隆重礼待的故事，却家喻户晓，并已写成剧本成为文学名著。这一古典舞剧在舞台上经常演出，在民间流传甚广，至今传为佳话。

我国史书记载蒲甘第一次正式遣使入宋，是在阿奴律陀的儿子江喜佗时期（1084~1112年）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当时的蒲甘王朝已经完成全国统一，国力日益强盛，已经成为中南半岛中的泱泱大国，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所以宋王朝在接待蒲甘来使时，应该用什么规格，尚书省曾进行了研究，结果朝廷

同意以大国礼节接待来使。据《宋史·蒲甘国》记载：“蒲甘国崇宁五年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辇。尚书省言：‘注辇役属三佛齐，故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緘以匣襪，今蒲甘乃大国蕃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国礼，凡制诏并书以白背金绫花纸，贮以间金镀匣、银管籥，用棉绢夹襪緘封以往’。从之（文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上述记载反映了中国对当时缅甸已经成为大国的情况十分了解，而且对它也非常重视。学者们认为这次来使的路线是取海路入宋的<sup>③</sup>。

蒲甘第二次遣使入宋，是在1136年缅王阿隆悉都时代。据《宋会要》载诏书云：

“绍兴六年（1136）七月二十七日，大理、蒲甘国表贡方物，是日诏大理、蒲甘国所进方物，除更不收受外，余令广西经略司差人押赴行在（今杭州），其回赐令本路转运提刑司于应管钱内取拨付本司，依自来体例，计价优与回赐，内章表等先次入递投进，令学士院降敕书回答。”

龚鼎臣的《东原录》记载得比这更详细。他说：“绍兴丙辰（六年）夏，大理国遣使……，蒲甘国遣使俄记乘摩诃菩进表两匣及金藤织两个，并系大理国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可见这次来使是由陆路经大理国，并与该国使者一起入宋的。

此外，蒲甘同中国大理的地方政权，关系也很密切。据《南诏野史》记载：“崇宁二年（1103）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缅人（即蒲甘）、波斯（今缅甸勃生）、崑崙（今缅甸莫塔马）国进白象及香药至大理。”；“政和五年（1115）缅人进金花犀象于大理。”

根据以上记载，缅甸不论同宋朝的中央政权和云南大理的地方政权，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从“表贡方物”和“计价优与回

赐”来看，显然是一种“朝贡贸易”性质的物物交换。但它又不只是经济上物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象这样多的经典著作和药书的相互传播，对发展两国的宗教哲学、医学、药理学……等精神文化，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同宋朝的交往，大多是通过云南大理进行的。由于皇佑五年（1053）大理段思廉时期发生了广南西路依智高入奔大理事件。此后大理与宋朝中央政权的联系加强了。又据周去非《岭外代答》“通道外夷”中记载，因当时邕州置买马司，设博易场，广西邕州通过大理至蒲甘有陆上交通。1136年蒲甘遣使入宋就是走这条路线的。宋朝因西北产马区被辽金、西夏所占，缺战马。熙宁七年（1074）杨佐应募出使云南，招买战马。④大理产的“越燄聪”是著名的良马，而蒲甘亦多马。据《诸蕃志》“蒲甘条”说：“其国多马，不鞍而骑。”缅甸的马最早也是从大理传入的。因此，大理在贩马中，起了与宋王朝和蒲甘之间，互通有无的媒介作用。蒲甘同宋王朝和大理的关系都很密切。缅甸著名作家索基写的《蒲甘集市》中还描述中国商人常至蒲甘经商，同缅甸人试比才智的故事⑤。

蒲甘是缅甸的古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代的佛教圣地。至今蒲甘还遗存着举世闻名的数千座佛塔。这些宏伟建筑承袭了古代的传统，具有宗教形式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特征，充分表现出缅甸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它是东方各族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也是缅甸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这些佛塔中，不但可以看到缅甸各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及印度形式的建筑和雕塑，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形式的佛塔和从中国传入的佛像。据缅甸考古学家杜生诰的考证。从11世纪建造的佛塔和佛像来判断，蒲甘的文化曾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例如悉塔那（sittana）佛塔和瑞珊陶（Shwesan-daw）佛塔中，都有从中国传入的弥勒佛像。他还在一所佛寺中发现一座无首佛像，

缅甸人民认为是阿弥陀佛像，亦即中国佛教徒所喜爱的无量寿佛。著名的瑞喜宫佛塔和瑞陶辛佛塔遗迹，就其建筑的结构和形状的特点来看，酷似北京的白塔寺。至于守卫在塔寺门前的一一对巨大的石狮子和它们颈上的悬铃饰物，无疑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sup>④</sup>在蒲甘的佛塔寺庙中，还可以看到从中国传入的辐射拱门和形如北京故宫的多层飞檐楼阁。宏伟壮丽的阿难陀寺还珍藏着1500幅壁画，可与我国佛教文化瑰宝敦煌壁画相媲美，并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优波离戒坛中的壁画，其风格和笔调酷似我国唐、宋人的作品。<sup>⑤</sup>缅甸学者认为蒲甘后期的缅甸绘画艺术，曾受我国的影响。<sup>⑥</sup>

此外，在《诸蕃志》“蒲甘”条中还记载：“其国奉佛尤谨”；“国有诸葛武侯庙”。在蒲甘的出土文物中有：汉文的碑铭、青铜制的中国佛像金刚手(Chinkang Shou,梵名yajrapani)、中国制铜鼓（中国人称诸葛鼓、缅人称蛙鼓“pā'-zi”）中国文人使用的一对鸭子形的陶瓷水盂和磨墨的砚台。<sup>⑦</sup>这些古代文物证明蒲甘时代曾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以上从秦汉到两宋，都是根据13世纪以前的中国史籍记载有关中缅两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内容丰富、翔实可靠。缅甸史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认为这些史料非常珍贵，是中缅两国难得的共同财富和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这一历史事实还有力地批驳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例如被称为缅甸史“权威”的英国学者哈威(G. E. Harvey)先生，竟然说：“中国史籍中，未尝提及十三世纪以前对缅甸有任何直接关系。”<sup>⑧</sup>的这一谬论。

#### 注释：

①《三个龙蛋》的故事，详见缅中友协编：《华人抵缅各地记》(缅

文)第18—20页。

②〔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译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6—27页。

③陈毅《燕子湖边》诗：“燕子湖边几时停，主人好客客来频。不言十日平原饮，瑞苗胞波总关情。”见《陈毅诗稿》130页；《在下关宴缅甸友人》诗中有：“一盘素，几杯酒，欢叙多，子为我跳华舞，我为君唱缅歌，这般亲切友谊，压倒灯红酒绿，满座笑呵呵！此会谁宾主？瑞苗与胞波。”

④莫里斯：《缅甸出土的史前石器》(T. O. Morris “The Prehistoric Stone Implements of Bunma”，JBRS, 1935, VOL. 25 Pt. 1)载《缅甸学会学报》1935年第25卷第1期。

⑤莫里斯：《缅甸出土的铜器和青铜器古物》(T. O. Morris: “Copper and Bronze Antiquities From Bvurnma” JBRS, 1938, vol. 28, Pts 2)载《缅甸学会学报》1938年第28卷第2期。

⑥缅甸的原始居民是尼格黎多人，见拙译〔缅〕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页。

⑦关于缅甸的民族可参阅：1. 〔缅〕波巴信：前揭书第47页；2. 〔缅〕吴顶貌：《蒲甘时代的文化》中“缅甸民族的起源”(缅文)第1—16页；3. 恩力魁：《缅甸的民族》(C. M. Enriquey: “Races of Burma”)。

⑧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

⑨见《陈毅诗稿》第98页。

⑩即由四川经滇缅至印度的道路。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

⑪1.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9页。

2.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137～185页。

⑫〔英〕哈威《缅甸史》姚橛译，陈炎校订商务1957年版第51页。

⑬见拙文《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载《东方研究》1980年第1期；《世界史论文集》1981年第1辑，社会科学战线社出版。

⑭中外学者考证者很多，难予一一列举。可参阅1. 〔日〕藤田丰

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版第83页；2. 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海上交通路线试探》载《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⑮哈威：前揭书第40页。

⑯拙文《南海丝绸之路初探》载《东方研究》1982年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⑰拙文《略论海上丝绸之路》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和《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3年第1期。

⑱1. 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第23页；2. 方国瑜：《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载《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

⑲见夏光南：前揭书第23页和波巴信《缅甸史》第10页。

⑳张衡：《西京赋》见《文选》；傅玄：《正都赋》见《艺文类聚》卷61引。

㉑李龙《平乐观赋》见《艺文类聚》卷60引。

㉒〔日〕藤田丰八：前揭书第106页。

㉓赵邦彦：《汉画所见游戏考》；曾昭燏：《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拙文：《古代中缅文化交流》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

㉔向达：《蛮书校注》第171—173页。

㉕波巴信：《缅甸史》第21页。

㉖赵朴初文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8日。

㉗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75页。

㉘李根源：《曲石诗录》第4卷第6页。

㉙〔缅〕杜生诰：《缅文中的中国字》（Taw Sein Ko: “The Chinese Words in Burmese”）载《印度古物》（Indian Antiquity）杂志（1906）。

㉚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

㉛梁启超：《千余年前的中国留学生》见《梁任公演讲集》商务。

㉜藤田丰八：前揭书第1—31页；张星烺：前揭书第6册第303页。今人亦有以为在丹那沙林以南的北大年。

㉝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0；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⑳见《白香山集》卷3。

㉑《后汉书·陈禅传》卷5。

㉒参见〔日〕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郭沫若译第83—92页。

㉓缅中友协编：《文化与友谊》（缅文）第17页。

㉔近年来缅甸史学家吴耶生（缅籍华人中文名陈孺性）利用中国史料写了不少中缅关系史的文章，其中《公元802年骠国使团访华考》已从缅文拙译中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㉕详见拙文：《唐代骠国献乐考》载《学术论文集》198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

㉖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第152页。

㉗蒲甘至大理五日难于到达。据元朝征缅路程：自腾冲至蒲甘共计43天，加上大理至永昌六日程。疑文中“五程”，为“五十程”之误，中间漏了一个“十”字。

㉘见缅甸《琉璃宫史》（缅文）第一卷有关“阿奴律陀事迹”。

㉙〔日〕杉本直治郎：《蒲甘国史の入宋问题》载《鹿儿岛大学史录》1970年第3期。

㉚见杨佐《云南买马记》。

㉛林煌天译：《缅甸短篇小说集》1981年外国文学出版社。

㉜杜生诰：《中国古物在蒲甘》载《缅甸学报》1912年第1卷第2期。

㉝优波离戒坛和壁画，参阅吴顶貌：前揭书第16和170页及附图。

㉞见缅中友协编：《文化与友谊》（缅文）第13页。

㉟出处同上注㉞。

㊱哈威：前揭书第49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东语系